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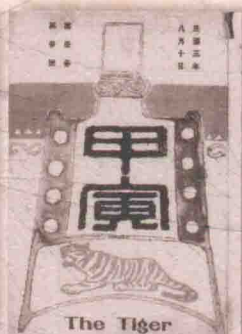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八

〔日〕森川裕贯 / 著

袁广泉 / 译

政论家的矜持

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八

〔日〕森川裕贯 / 著

政论家的矜持

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

袁广泉 / 译

政論家の矜持

—— 中華民国時期における
章士釗と張東蓀の政治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论家的矜持：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 /
(日)森川裕贯著；袁广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7.3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7-5201-0100-4

I. ①政… II. ①森… ②袁… III. ①章士钊 (1881~1973) - 政治思想 - 研究 ②张东荪 (1886~1973) - 政治思想 - 研究 IV. ①D092.6 ②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0530 号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八

政论家的矜持

——章士钊、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

著 者 / [日] 森川裕贯

译 者 / 袁广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徐碧姗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4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100-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6-9706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I

CONTENTS

序 章 政论家章士钊与张东荪	1
一 两位历史人物的谢世	1
二 本书课题：三个论点	3
三 章士钊与张东荪的关系	20
四 研究现状	21
五 内容和结构	25

第一部 章士钊的政治思想

第一章 追求英国式政治制度

——《民立报》时期章士钊的

政治制度构想	32
前 言	32
一 民国元年的政治制度构想	34
二 章士钊的政治制度构想	40
三 “记者”的自觉	52
四 辞离《民立报》与创办《独立周报》	54
小 结	56

第二章 抵制“好同恶异”

——《甲寅杂志》时期章士钊的政治思想	58
前 言	58
一 “君子”政治	
——梁启超的构想	59
二 批判“专制”与拥护“政谭”	
——章士钊的构想	62
三 梁启超与章士钊的差异	68
四 “政理”探索者	71
小 结	76

第三章 失望于议会政治而寄望于职业代表制

——从《联业救国论》看章士钊政治思想的转变	78
前 言	78
一 《联业救国论》的内容	82
二 与沃拉斯的对话	86
三 橘朴对《联业救国论》的批判	89
四 提倡“业治论”	94
五 政论家章士钊的谢幕	97

第二部 张东荪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政论家张东荪登场	106
前 言	106
一 建立内阁制的意图	107

二 抑制“野心家”的政治制度构想	111
三 各种制度构想的共通意图	120
四 倡导贤人政治	124
小 结	132

第五章 直面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论战与张东荪	134
前 言	134
一 中国社会主义论战的展开	137
二 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论	142
三 “非我族类” ——高一涵对张东荪的批判	147
四 被监督的监督者	150
五 “怀疑”与“讨论”	154
小 结	156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张东荪的逻辑

前 言	158
一 关于“共赴国难”的讨论	160
二 民主政治之修正	163
三 政治评论的必要性	171
小 结	173

第七章 审视政治之“士”

——张东荪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思想	176
前 言	176

一 民主主义与“士”	178
二 如何解决“剥削”问题	184
三 可限制与不可限制的自由	188
小 结	193
 终 章	 195
一 本书内容之再梳理	195
二 对政论家章士钊和张东荪的评价	197
 补 论 高一涵思想的形成 ——以“五四”前后为中心	 205
前 言	205
一 来自章士钊和日本相关著作的启发	207
二 英文著作解读	211
三 日本大正时期思潮的影响	216
小 结	222
 参考文献	 224
 索 引	 248
 中文版后记	 260

序 章 政论家章士钊与张东荪

一 两位历史人物的谢世

1973年7月，章士钊在香港病逝。此前，5月，章士钊为会晤三夫人殷德贞，从大陆来到香港。但外界揣测此行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授意，章士钊或负有斡旋大陆与台湾和平谈判的使命。然而，章士钊时年已逾九十，此次赴港似不堪重负，抵港后不久即病重不起，溘然而逝。^①

章士钊在清末与呼吁推翻清朝的黄兴、章炳麟等交谊深厚，在与其一道从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其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在1910~1920年代，以其活跃的言论活动得到社会关注。1920年代中期曾任教育总长而参与国政枢要，但政治生命并不长久，1930年代后在发表政论的同时也做过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似主要专心于著述。^②

章士钊一生交友广泛，其中有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段祺瑞、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卓有贡献的李大钊、帮会组织青帮头目杜月笙等背景、党派

① 请参阅锓屋一《章士钊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芙蓉书房出版，2002，第429~449页。

② 章士钊的主要著作有分析唐柳宗元散文的《柳文指要》，1971年出版。章士钊幼年起熟读柳文。关于《柳文指要》，请参阅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钊、鲁迅——辛亥人物的死与生》，龙溪书舍，1974，第292~334页。

迥异的人物。毛泽东亦其中之一。

1920年，青年毛泽东为给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筹资来到上海。^①在受到无名青年毛泽东请求后爽然承诺并为筹资倾尽心力的，就是毛的湖南同乡章士钊。对当时已是著名人物的章士钊表现出的善意，毛泽东大感意外，直至晚年仍心谢不已。或许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受到的待遇可谓优厚。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知识分子受到迫害，但章士钊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基本没有受到冲击，安稳地度过了这一特殊时期。^②受到毛泽东保护的章士钊逝世后，报纸曾做大幅报道，其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朱德、周恩来等都列席葬礼。客逝香港的章士钊做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在晚年未受政治迫害，可谓寿终正寝。

就在章士钊逝世前后，张东荪正在北京的秦城监狱迎来其悲惨的最后时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迫害，被监禁数年后病逝。^③较之章士钊逝世后所受礼遇，张东荪逝世后的待遇只能用孤寂落寞来形容。

曾于清末留日、主要学习哲学的张东荪，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正式开始其言论活动。他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梁启超及其弟子张君勱有深交，曾与他们一同经营多种杂志及报纸，并发表过许多文章，逐渐确立了在言论界的地位。张东荪还是著名的哲学研究者，1930年后曾执教于北平的燕京大学，讲授哲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内战中曾为

①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即前往法国边工作边学习的留学运动，自1919年持续至1921年。请参阅森时彦《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小史（上）（下）》，《东方学报》（京都）第50册，1978年2月；第51册，1979年3月。

② 章士钊在北京的住处曾遭红卫兵冲击，但在毛泽东、周恩来干预下而免受其难，后来居住、生活环境得到保障。请参阅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第51～61页；锓屋一：《章士钊与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第437～439页。

③ 张东荪的生平，请参阅如下著作之相关记述。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和平解放北京积极斡旋，对实现和平卓有贡献。该时期，张东荪还出版过不少著作，将其思想、见解公之于世。^①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的境遇十分坎坷。他曾作为民主党派重要人物之一受到优待。但在1949~1950年，他频繁接触美国外交人员并为其提供情报，被认定为泄露国家机密，其后即受到冷遇。在1952年燕京大学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都受到激烈批判。迫害也波及家人，其长子、著名昆虫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等的张宗炳因此精神失常，次子、著名物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等的张宗燧自杀。而张东荪本人也在迫害中结束了一生。

二 本书课题：三个论点

1. 政论家的自我认识

章士钊和张东荪尽管生前境遇如此不同，但他们的一生也存在相近之处。他们都曾大量阅读政治学、法学著作，并在民国时期（1912~1949）撰写、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

关于“政论”，并无明确定义，但大体包括如下内容：从针对当下政治形势及具体政策的具体的时事性评论，到试图提出中国应引入和建立的政治制度，乃至对于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所做的原理性分析等。实际上，时事性评论和原理性分析难以明确区分，一般而言，前者包含

^① 张东荪的主要著作（单行本）如下。《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24；《人生观ABC》，世界书局，1928；《精神分析学ABC》，世界书局，1929；《新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29；《道德哲学》，中华书局，1931；《现代伦理学》，新月书店，1932；《认识论》，世界书局，1934；《价值哲学》，世界书局，1934；《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思想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46；《理性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46；《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察社，1948。

后者，而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不过，章士钊和张东荪更关心、更擅长的，是为提出中国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而做原理性探讨。

章士钊和张东荪作为政论家，并非孤立于社会而独自思考和构建其政治观点，而是努力吸收国外政治学及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其时，章士钊自称“记者”或“哲学家”，而张东荪则自称“第三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将撰述和发表政论视作本分，并对自己尽此本分深感自豪。本书将自称“记者”、“哲学家”、“第三者”、“政治评论家”的章士钊和张东荪称作“政论家”，并探讨他们作为政论家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既有研究已有明示，中国近现代发表政论者绝非仅此二人。早在1870年代初以后，商人、买办、洋务官僚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曾陆续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创办和发行报纸，关心政治的记者们在这些报纸上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①

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末代表性思想家之一梁启超，他曾在1890年代后以杂志《时务报》及《知新报》等为阵地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②

1898年，康有为拥戴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即戊戌变法，遭慈禧太后还击而失败，帮助康有为推进变法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就创办《清议报》以积极发表其政论文章。在纪念该刊发行第一百期（册）而撰写的文章中，梁启超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促请读者注意三大自由的重大意义。该三大自

①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有1872年创办于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1874年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1886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不过，这些报纸所刊载的相当部分是商业性文章，而不全是政论文。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0, 234.

② 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曾以梁启超为核心鼓吹君主立宪制。《知新报》于1897年创办于澳门，其刊文与《时务报》一样鼓吹君主立宪制。

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推动者则是报馆（报社、杂志社）。他说，“报馆”负有“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的责任，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①

梁启超强调中国应该仿行欧美各国的“报馆”。他描述道，“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指出“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他说，实际上，欧美各国的大型报馆，因“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举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 - 1865）、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 - 1898）等为例解说道，上述情形最终形成了“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的局面。

由其论述可知，梁启超认为，政治家和发表政论者即政论家可以反复相互替代，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其后的梁启超无疑仍是以这种态度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因为，民国成立后，他在发表政论的同时也为成立民主党、进步党而竭尽全力，还曾作为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国政。在梁启超看来，政治家和政论家彼此并无畛域，由此一领域踏入另一领域既不困难，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梁启超的这种看法与章士钊和张东荪大相径庭。如本书所述，章、张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存在距离，且不可轻易迈越，二者的责任不是连续的。换言之，他们为政论家规定了不同于政治家的特殊责任。

当然，赋予政论家以重要意义的并非只有章士钊和张东荪。在民国时期，以敏锐目光审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还另有其人。比

^① 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0日。

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之一、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其在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1917年就撰写过《政论家与政治家》一文，明确论述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关系。

李大钊论道：“发育人文助进群化之事业，固自多端。简而举之，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与实际的方面而已”。从事精神方面工作的有政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宗教家等，而从事实际方面工作的则包括政治家、实业家、医生、军人等。而“此二种事业，其于人类社会，皆所要需，或相张弛，或相错综，或相递嬗，或相并行，固不可有所轻重轩輊于其间也”。然后分别举出实际从事此两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前者有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伏尔泰（Voltaire, 1694 - 1778）、康德（Immanuel Kant, 1724 - 180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 - 1674）、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 - 1824），后者则有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 - 1821）、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 - 1898）、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 - 1658）、格莱斯顿、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 - 1881）等。^①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就政论家和政治家分别应负的责任做了分析。

在分析中，李大钊明言“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②具体而言，政论家的使命是提出新标准，眼光多朝向未来，重视进步、倡导

① 守常（李大钊）：《政论家与政治家（一）》，《甲寅日刊》1917年2月25日，转引自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1~302页。另，“卢梭”、“伏尔泰”、“拿破仑”、“歌德”、“弥尔顿”、“俾斯麦”、“克伦威尔”、“格莱斯顿”、“迪斯雷利”，李大钊文分别作“卢骚”、“福禄特尔”、“拿翁”、“圭得”、“米尔顿”、“俾士麦”、“克林威尔”、“古莱斯顿”、“奇士雷里”。再，本书参考文献中西方人名或与今译不同者，除直接引用外，论述一般从今译，另于文中适当位置或相关注释中予以说明。

② 守常：《政论家与政治家（二）》，《甲寅日刊》1917年3月2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05页。

理想，以排除滋生弥漫于国民间的懈怠沉滞气象；而政治家的使命则是改善现状，眼光多关注现实，重视秩序，以当时的实际政治情形为标准逐个形成适当政策。

基于以上理解，李大钊提出的标准是“为政论家者，虽标旨树义超乎事实不为过；而为政治家者，则非准情察实酌乎学理莫为功”。发人深省的是，李大钊又说，“世有厚责政论家，以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殆两失之也”，其立场显然更倾向于政论家。^①虽然他也说，“平情论之，二者均不可或缺，惟因时势之迁移，一时颇有畸轻畸重之感”，^②但其文明确显示，他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政论家的远大理想。^③

与李大钊一样，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也曾强调政论家必须承担其特殊责任。他在1922年撰写《政论家与政党》一文详细论述其观点。^④

胡适在该文开头提出了一个早已“在许多人的口头和心上”的问题，即“政论家可以不入政党，不组政党，而仍可以发生效力吗”，然后将政论家分作三类，即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

关于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胡适断言他们“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没有必要探讨。他对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评价极高，称他们以公正态度批评反对党，而不做恶意攻击，即使对自己的政党，若有意见也会进行公正的批判和弹劾；“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

① 守常：《政论家与政治家（二）》，《甲寅日刊》1917年3月2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05页。

② 守常：《政论家与政治家（一）》，《甲寅日刊》1917年2月25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01页。

③ 守常：《政论家与政治家（二）》，《甲寅日刊》1917年3月2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05页。

④ 胡适：《政论家与政党》，《努力周报》第5期，1922年6月4日。

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

但是，胡适最希望读者关注的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文中对这类政论家的论述占据最大篇幅。他认为，“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他强调中国需要这类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

胡适认为，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视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他进一步描述他们的特性说，“也许他们的性情与才气是不宜于组织政党的；他们能监视而未必能办事，能计划而未必能执行，能评判人物而未必能对付人，能下笔千言而见了人未必能说一个字，或能作动人的演说而未必能管理一个小团体”，主张应该利用他们的优点，而不应误用他们的缺点。

那么，需要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具体理由何在？胡适认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发展下去，最后只会形成各政党“政见”互不相让的局面。

胡适期待能有一种力量对各政党的观点进行“评判”、“调解”，并“研究事实”、“观察时势”，关注舆论要求而提出主张。这种力量就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的意图是使全国的政党尊重并采纳此类政论家的意见，最终使政治得到改良。

从以上探讨可知，李大钊和胡适都意识到政论家和政治家应保持距离。或者说，他们在特意强调只有政论家——而非政治家——才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众所周知，对法学、政治学兴趣浓厚，并运用这方面知识发表过许多政论文的李大钊，在发表《政论家与政治家》后不久，即在俄国革命后转而关心马克思主义，并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实践中去。若将这些实践视作政论家的活动，或者要从这些活动中发现政论家和政治

家的矛盾关系，恐怕都不太恰当。不难想象，随着试图改变中国政治混乱状况的热情愈益高涨，李大钊内心可能已不再认为有必要考虑政治家和政论家应如何保持距离。但是，李大钊的实践为严酷现实所阻，最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① 李大钊在结束其短暂一生之前，未能有机会展现和发挥其在《政论家与政治家》中所主张的政论家应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矜持。

与李大钊不同，胡适在发表《政论家与政党》后仍继续发表政论。关于胡适作为政论家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尤其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既有研究已有大量积累。^② 从这些研究来看，胡适基本上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所需要的执政集团，但仍不惮严厉批判，故其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十分复杂，很难以“拥护”、“屈服”等轻易判之。^③ 此外，胡适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驻美大使的要职，但与李大钊相比，他对跨越政论家和政治家的界限，态度是相当慎重的。

不过，坦率地讲，要把胡适看作政论家，仍应有所保留。众所周知，胡适曾留学美国，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1859 - 1952）并获博士学位，^④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同时发表过许多政论文章，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确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他并非专治政治学，其政治理论也因此观点并不深刻。所谓“应有所保留”即对此而言。实际上，较之章士钊和张东荪，

① 关于李大钊的生平，请参阅石川祯浩《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赵景达、原田敏一、村田雄二郎、安田常雄编《讲座 东亚知识分子 3 “社会”的发现与演变 兼并韩国至满洲事变》，有志舍，2013。

② 此类研究为数不少，本书主要参阅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26～274页；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③ 关于此点，请参阅陈红民论述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胡适与蒋介石研究论纲》，岩谷将译，山田辰雄、松重充浩编《蒋介石研究——政治、战争、日本》，东方书店，2013。

④ 关于胡适和杜威的关系，章清《胡适与杜威——其师生关系反映出的中国近代思想之一斑》（森川裕贵译）述之甚详。参阅赵景达、原田敏一、村田雄二郎、安田常雄编《讲座 东亚知识分子 3 “社会”的发现与演变 兼并韩国至满洲事变》。

胡适的政论难免失之肤浅。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认为，要加深对政论家的理解，恰当而有益的观察对象应是具备了政治学素养的章士钊和张东荪，而非李大钊和胡适。加之，李大钊和胡适都与章士钊创办、主编的《甲寅杂志》有关，^①也都比章士钊年轻，他们对政论家的定位很可能曾受到章士钊观点的影响。

此外，不少研究指出，梁启超、胡适等不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都带有“士大夫意识”。^②所谓“士大夫意识”的含义，学者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大体如下。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强烈关心现实政治，他们认为政治的核心力量是自己而非民众，而这种自负与清代以前的士大夫一脉相通。但是，他们组织并运行政党、通过选举赢得民众支持以促进政治进步，或积极与民众合作开展政治运动的意愿并不强烈。换言之，知识分子虽然积极议政，但一旦感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就不再愿意主动参与政治。知识分子并不看重民众的作用，往往忌讳和回避参与实际政治所必须承担的种种负担。直言之，知识分子喜欢对政治高谈阔论，在看到自己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时也会直接参与政治，但一旦其政治实践遇到困难，或嗅到政治粗俗、肮脏的气息，就会避开政治实践而专事议论。这种观察多用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局限，即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止后仍然未能摆脱旧有的精英意识，因而虽对现实政治有所建言，却无从发挥其作用。

① 李大钊和胡适在《甲寅杂志》发表过的部分文章如下。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Alphonse Daudet：《柏林之围》（胡适译），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胡适：《非留学——致甲寅杂志记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是法国19世纪小说家。

② 关于此点，本书参照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91~241页；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490~504页；李金铨：《近代中国的文人论政》，李金铨编《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政大出版社，2008；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